

89年以來

中國
國

經濟形勢今折

·陳世平主編

·勵志出版社

198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形勢分析

國世平 主編

勵志出版社

1993·香港

中國經濟形勢分析

主編：朱世平

198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形勢分析

主編 國世平
出版 励志出版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14號僑興大廈
18B, 電話: 8070637)
經銷 三聯(香港)書店
初版 一九九三年二月
國際書號 ISBN962-7473-05-7
定價 港幣五十五元整。美金七元整
人民幣肆拾玖元整
設計 譚仁傑

目 錄

第一章 低谷走向高漲：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政策分析與評估	(1)
一 各種矛盾激化	
——中國領導層對處理經濟問題發生嚴重分歧	
二 代價沉重的整頓	(1)
——治理整頓主要目標沒有得到有効解決	(4)
三 治標不治本的倒退辦法	
——治理整頓失効之原因考察	(12)
第二章 停滯中的徘徊：198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形勢分析與評估	(22)
一 是飛躍，還是冒進	
——1984—1988年經濟增長形勢的重新評估	(22)
二 緊縮需求的得與失	
——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問題及其成因	(32)
三 沒有擺脫“怪圈”的循環	
——對投資啓動的評估	(49)
四 制度創新、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通向協調增長的選擇	(52)
第三章 逆轉中的改革：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制變化的分析與評估	(59)
一 國內和國外的壓力	
——中國經濟改革面臨嚴重考驗	(59)

二	極左思潮死灰復燃	
	——否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極“左”理	
	論種種.....	(62)
三	可怕導向與權力壓迫	
	——中國體制僵滯和復歸頗為嚴重.....	(66)
第四章	公有制下的寵兒：1989年以來中國國營工	
	業企業形勢分析與評估.....	(80)
一	失敗和錯位的調整	
	——1989年—1991年中國國營工業企業形	
	勢實證分析.....	(80)
二	在低効和惰性中循環	
	——中國國營工業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87)
三	徒勞和微効的輸血	
	——國家調控措施及其效應評估.....	(94)
四	不作國家的寵兒	
	——中國國營工業企業體制改革簡要分析.....	(98)
第五章	波動中增長：1989年以來的中國鄉鎮企業	
	發展分析與評估	(106)
一	政策支持與突飛猛進	
	——1989年以前鄉鎮企業的發展	(106)
二	政策的壓迫和資金短缺	
	——1989年的宏觀緊縮波及鄉鎮企業	(110)
三	柳暗花明又一村	
	——鄉鎮企業在困境中尋求發展機會	(112)
四	支柱性企業地位的確立	
	——鄉鎮企業發展的新時機	(121)
第六章	潛網下的潛力：1989年以來的中國個體私	
	營經濟發展分析與評估	(127)

一	坎坷不平的歷程	——1989年以來中國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概況	(127)
二	發展中的暗流	——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36)
三	光輝燦爛的前景	——各級政府的扶持和個體私營經濟的新發展	(139)
			(141)
第七章	增產與增收的矛盾：1989年以來的中國農業發展形勢分析與評估		(152)
一	價格失調和政策失誤	——1989年以來中國農民收入增長下降的主要原因	(153)
二	不可等閑視之的後果	——1989年以來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率下降所造成的後果	(160)
三	長期受到忽視和冷落	——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率下降的深層次原因	(164)
第八章	經濟中的調節器：1989年以來的中國貨幣金融形勢分析與評估		(178)
一	錯覺與錯位	——1989年以前的中國貨幣金融形勢掃描	(178)
二	過度的干預	——1989年以後的中國貨幣金融形勢分析	(181)
三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1989—1991年的中國貨幣金融政策簡評	(186)
第九章	最熱點的行業：1989年以來中國證券市場大透視		(191)
一	從無到有以及從小到大		

——中國證券市場迅速發展	(191)
二 決非一帆風順的發展	
——中國證券市場進一步發展面臨的障礙	(198)
三 恰當和科學的對策	
——中國應盡快完善證券市場	(208)
四 方興未艾的發展	
——中國證券市場展望	(215)
第十章 中國經濟的新軍：1989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形勢的分析與評估	(221)
一 後起之秀和異軍突起	
——中國對外經濟突飛猛進	(221)
二 體制改革的淨收益	
——中國對外經濟發展原因探源	(230)
三 發展中受挫	
——1989年以來中國對外經濟面臨困境	(234)
四 發展中的任重道遠	
——中國對外經濟前景光明	(242)

第一章 低谷走向高漲

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政策分析與評估

1989年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這種轉折從1988年底已開始，但到1989年便充分顯示出來。從這一年開始到1991年，中國經濟形勢明顯不同，經濟體制改革非但沒有推進，相反還發生巨大逆轉，中國經濟幾十年來第一次出現市場疲軟，經濟從此走向低谷。經濟事件與政治事件交結在一起，令人不敢對該時期經濟政策進行恰當評估，今年鄧小平南巡，既在經濟領域進行了一次北伐，又在政治上進行又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才得以有機會和勇氣對中國該時期經濟政策進行評估。

一、各種矛盾激化

——中國領導層對處理經濟問題發生嚴重分歧

舉世共認，1984年至1988年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具體表現在SNA體係的國民生產總值和MPS體係中的國民收入。1984—1988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1.5%，其中第一產業增長4.98%，第二產業增長14.3%，第三產業增長14%。該時期國民收入也增長11.2%。應該肯定，中國在這時期所取得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於改革前的速度，其中1984—1988年國民收入平均增長速度比1953—1978年高5.2個百分點。除個別年份低於南

韓外，中國1984—1988年的增長速度也高於同期日本、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

然而也應看到，該時期經濟高速增長也引發了許多矛盾。經濟明顯過熱引起因1984年調整初步得到緩解的國民經濟結構矛盾再度出現緊張；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的供求缺口擴大，國家外匯結存急劇下降。更為嚴重的是經濟過熱致使總需求擴大，推動了通貨膨脹。1988年社會商品零售物價總指數由一月的9.5%上漲到九月的25.4%，資本品價格指數也由一月份的10.5%上升到九月份的25%。物價迅速上漲，使居民、企業的通貨膨脹預期上升。在儲物保值心理影響下，購買行為扭曲，超常超量地搶購物資和商品，造成在居民收入不斷增長、企業資金來源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企業與居民在銀行存款的增幅不斷下降，銀行的存貸差額不斷擴大，迫使專業銀行大幅度運用超額儲備和以中央銀行發放巨額再貸款方式，彌補存貸缺口。1—8月份，中央銀行再貸款增加額比1987年同期多增361.3億元；1—9月份專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超額儲備比1987年同期下降了131.4億元。由於銀行信貸資金超負荷運行，沒有留足必要的備付金，在八月份居民擠兌存款搶購商品，企業進入用款高峯時，銀行出現支付困難。

面對這一困難局面，中國領導層發生了明顯的意見分歧，在處理這一複雜局勢的措施便有很大不同。一是主張推進價格改革，以加速經濟增長來解決這些問題；一是主張採取緊縮政策，放慢甚至停止經濟增長來控制物價上漲。可以說，在1988年6月份之前是第一種意見占上風，1988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加快價格改革和北戴河政治局會議公報進一步宣布在五年內實現這一改革。筆者認為，中國領導層提出的這一方案應該是對的。然而，為什麼事與願違，出現了八至九月的失控局面呢？這恐怕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在需求旺盛條件下，提高價格會減少需求，用經濟理論

一般原理來看是成立的。但是在中國消費領域過份狹窄，消費者沒有購買住宅、股票、黃金等保值品的條件下，必然會產生一種貨幣貶值損失的恐懼，從而致使居民大量購買一般日用品來保值。當然這裏也存在中國居民消費心理扭曲等原因。在這背景下，中國居民害怕貨幣進一步貶值，便盡可能購買實物品儲存來保值，價格上漲不僅沒有減弱，相反還加強。

二是在推進價格改革的措施上也有明顯失誤，這主要是急於求成思想所引起。中國在推進價格改革之前，先在廣東省試點，廣東省大部分物價首先放開。一段時間廣東省物價大幅度上漲。由於廣東省物價高於全國水平，全國商品都往廣東投入，商品的供過於求，造成廣東省物價開始下降，最後降至全國同一水平。如果中國領導層按照這一思路，再放開廣東毗鄰的湖南，接着是江西，中國物價上漲便不會走到1988年那種局面。然而十分可惜，看到廣東省放開物價沒有造成價格震蕩，便決定在全國實施價格改革方案，結果價格上漲，又沒有過多的商品投入市場，致使物價惡性上漲。

三是存在盲目樂觀情緒，對於已經很嚴峻的貨幣流通形勢缺乏認識，未能及時採取緊縮需求和疏導貨幣的措施；對中國居民的輿論導向上也有缺點，例如未能說明什麼是價格改革以及價格改革將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而是籠統地號召“渡難關”，並且把八月提高名酒名煙價格與全面的價格改革混為一談；加之中國長期流傳一種把價格改革等同於物價上漲的說法，因而相當一部分居民在聽說價格將要全面改革後產生了擔心價格會猛漲的預期心理，於是觸發了全國性的提款搶購風潮。

由於中國經濟局勢在進一步推進價格改革方案出臺後並沒有好轉，相反還有惡化趨勢，所以中國領導層中主張放慢經濟增長速度，採取緊縮政策來整治中國經濟的觀點開始占上風，這便導致中央1989年9月北戴河會議。從此中國開始採取一系列緊縮措

施，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治理整頓階段。依據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治理整頓要達到的目標有六項：1.逐步降低通貨膨脹率，要求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上漲幅度下降到10%以下；2.扭轉貨幣超經濟發行的狀況，逐步作到當年貨幣發行量與經濟增長的合理需要相適應；3.努力實現財政收支平衡，逐步消滅財政赤字；4.在着力提高經濟效益、經濟素質和科技水平的基礎上，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率，爭取國民生產總值平均率增長5—6%；5.改善產品結構不合理狀況，力爭主要農產品生產逐步增長，能源、原材料供應緊張和運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緩解；6.進一步完善各項改革措施，要求逐步建立符合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行政、法律手段綜合運用的宏觀調控體系。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中國領導層主要採取以下措施：一是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控制積累基金的增長；二是在財政和金融兩方採取緊縮政策；三是提高儲蓄利率，開辦保值儲蓄；四是從社會集團購買力和職工個人收入兩個方面控制社會消費基金的增長幅度；五是增加財政價格補貼。就在中國領導層實施緊縮政策時，又爆發了“六四”事件，在中國一片反貪污腐敗聲中，又加上了廉政建設。不久，中國經濟從高漲開始下降，最後一段時間達到負增長，治理整頓帶來的後果已開始顯現。

二、代價沉重的整頓

——治理整頓主要目標沒得到有效解決

從實際效果看，除降低通貨膨脹這一目標達到外，其他五項治理整頓目標均沒實現。通貨膨脹1989年零售物價指數由1988年的18.5%下降為17.8%，1990年進一步下降為2.1%。從通貨膨脹下降幅度之大中可以發現一些奇怪現象，即中國領導層原計劃

的三年整頓到了1989年底便將物價壓了下來，這是不是治理整頓採取了“神奇”措施？筆者認為，1988年下半年市場上表現出來的需求旺盛和搶購風，實際上有較大的虛假因素。因為中國人個人儲蓄畢竟有限，經過從1986年開始持續到1988年的搶購，中國居民手中的現金實際上已十分有限，基本情況是手中無錢的居民即便價格再漲，也不會搶購；手中有錢的居民在消費渠道十分狹窄條件下，即便價格上漲，保值心理促使購買，也再無商品可買。因此，即便中國政府不實施治理整頓措施，1988年那種虛假的購買力也會降了下來。應該看到，中國個人消費需求旺盛狀況之所以能持續兩年以上，是因為公共消費的介入，即政府消費和社會集團消費的介入，這種介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消費和社會集團消費擴大，擴大了需求；二是公共消費基金轉入個人消費基金中，擴大了個人消費需求。這種以公共消費需求支撐的中國整個需求在1989年上半年推行廉政建設時便受到猛烈壓抑，個人需求旺盛的虛假現象消失，公共消費又受到政府行政壓制，一下子便從需求旺盛過渡到需求不足，市場疲軟之現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下便擴充全國，前幾個月中國居民對市場的過度需求還談虎色變時，瞬間又被市場疲軟弄得不知所措。從此可以看出，治理整頓如果以壓低了通貨膨脹為自豪的話，那麼現實結果表明，即便沒有治理整頓，通貨膨脹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降下來。為此，人們不禁要問實行治理整究竟有無必要？

然而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治理整頓使中國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價。一是加大了財政赤字，使得治理整頓提出的逐步做到財政收支平衡、消滅赤字財政的目標不僅未能實現，相反還加劇了這種狀況。對中國政府來說，在中央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為了壓制通貨膨脹，便不得不背上高存款利率和物價補貼的包袱。據統計，象北京這類特大城市，降低物價一個百分點需增加財政補貼1億元左右，京津沪1989年補貼達120多億元，全

國的物價補貼數額高達400多億元。十分顯然，在中國財政狀況日益惡化條件下，要長期維持高物價補貼是不行的。中國以後情況也表明財政無力支持物價補貼。

二是中國企業在宏觀雙緊政策下，面臨兩面夾擊。一方面財政和信貸緊縮，企業普遍資金緊張；另一方面市場疲軟，銷售不暢，產成品庫存積壓。產成品資金占用增長率1989年9月份達到60.9%，而降價銷售又遇到企業成本的限制，其結果是企業盈利水平降低以至虧損增加。1989年1—10月國營企業預算內工業銷售利稅率比上年同期降低了2.34個百分點，企業虧損額增長率在1989年9月份達到123%。

三是中國居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89年1—10月份，職工工資總額1992億元，比1988年同期增長16.6%，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後，實際為負增長。暫且不管治理整頓能否給中國居民帶來實惠，但總不應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來推治理整頓。

四是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嚴重的“滑坡”，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由1988年的20.79%下降為1989年的8.54%，1990年進一步下降為7.76%。從月份看，工業總產值1989年9月開始接近零增長，10月出現負增長，1990年1月進入谷底。

五是企業“三角債”日益嚴重。至1989年底，企業間相互拖欠的債款額高達1000多億，1990年拖欠款進一步增加，企業“三角債”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有効解決，嚴重影響企業活力以及企業正常運轉。

另外，由於企業資金短缺，連正常運行所需的資金都無法保證，再加上企業在市場疲軟條件下產品缺乏銷路，產成品又積壓大量資金，致使企業開工不足，因此大量工人無事可作，有的工廠還象征性地發一些工資，有的企業乾脆不發，讓工人自謀出路，造成1949年以來隱蔽性的超級大失業。

如果說治理整頓使得大部分企業面臨破產境地狀況下，中國

政府乘機淘汰一批低效，虧損嚴重的企業，促使企業在效益提高上跨一個臺階，那麼治理整頓還有一點積極意義，然而十分可惜，“六四”事件，使中國政府將穩定性目標放在第一位，所以即便企業大幅度虧損，政府硬是壓銀行貸款為工人發工資，將虧損企業和無事可作的工人統統養起來，造成整個經濟效益不是提高，而是大幅度下降。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治理整頓所達到的六個目標進行評估。第一是降低通貨膨脹率。這一目標似乎已達到，然而仍潛伏一定的危險。首先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成本推動物價上漲的問題。因為中國通貨膨脹是受需求拉動、成本推動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1984年到1988年情況看，不僅總需求過大拉動着物價水平上升，成本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也非常明顯。實施治理整頓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需求從而緩解了物價上漲，但仍存在很大不足，即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因成本推動物價上漲的問題。由於中國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不是效益型而是速度型的，在經濟緊縮期間企業效益下降，成本容易加上從而又推動通貨膨脹的危險不是不存在的。其次在穩定物價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價格調整的範圍與幅度都受到限制，一旦放鬆穩定物價這一首要目標，通貨膨脹又可能引發。因為治理整頓目標是多方面的，不僅有降低通貨膨脹，還有調整總量、結構和提高效率等多重目標，這就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大體上保持原來不合理的價格體係，推遲和延緩理順價格的步伐。1989年度，通過採取限制、凍結物價和推遲調整比價的作法來加強物價的管理和控制，理順比價的工作基本上踏步。這不僅累積下來原有的價格不合理的矛盾，而且比價不合理的矛盾又有所加劇，出現了不合理的比價復歸現象。例如國家定價占比重較大的煤、礦石、原油等基礎工業品價格又陷入“鍋底”狀態，有的全行業虧損，有的已達虧損邊緣；部分農產品交換比價近年來也有擴大的趨勢。這些突出的價格不合

理問題，在今後幾年會形成很大的漲價壓力。另外，1989年治理整頓主要是採取以行政手段為主的控制物價措施，並沒有從經濟運行角度來理順價格，這樣，在行政措施一松動情況下，價格又會反彈上來，形成新一輪通貨膨脹。可以說，治理整頓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的隱患。

第二是扭轉貨幣超經濟發行的狀況，逐步做到當年貨幣發行量與經濟增長的合理需要相適應。然而這一問題也沒得到有効解決。一是以1979—1989年期間多發的貨幣沒有消化。據測算以1979—1989年的11年間，共增發貨幣2,132億元，即使扣除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等因素外，市場貨幣的累計多發300多億，到1990年底，市場貨幣流動量約2,644億元，1992年全年即使按計劃發行500億元，也明顯包含有超經濟發行的成份。另據統計表明到1991年底，市場貨幣流通量達到3,177億元，比去年同期約增加77%。再以貨幣供應增長幅度看，1991年上半年銀行現金支出增幅已達到26.8%，廣義貨幣的月增長率達30%以上。各項存款增加雖然擴大了銀行信貸資金來源，但同時又加大了貨幣供應總量的增長。所以，1991年貨幣發行的增長幅度，將大大超過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幅度之和。加之，從貨幣促進量（現金加存款）的增長情況後，1979年至1990年，貨幣供應量年均增長22.6%，高於同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2%的幅度，1991年又超過經濟增長16個百分點。所以，為了解決貨幣超量發行問題，中國政府設想了三條措施。1.通過發展經濟、增加國民收入辦法抵銷部分多餘的貨幣，然而在治理整頓期間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增長，相反還滑坡，出現負增長，所以這條措施根本沒有奏效。2.通過貨幣貶值，由貨幣持有者承受損失。然而，遇上“六四”風波，穩定目標壓倒一切，貨幣貶值導致政治風險的措施無法出台。3.用保值儲蓄等措施吸收部分多餘貨幣的辦法。中國政府的確採取了這一措施。但是，在財政信貸雙緊措施下，銀行用高利吸收的存款

又被國家限制，一律不準貸出，導致銀行普遍虧損，最後又不得不放棄。

二是中國從1991年開始進入內外債償還高峯，每年財政都要有巨額的淨流出。十分顯然，中國財政在此時期更為困難，財政赤字有增無減，龐大的赤字有相當部分又必然反映到銀行增發貨幣上來。可以說，治理整頓第二個目標也沒達到。

第三目標是努力實現財政收支平衡，逐步消滅財政赤字。在治理整頓期間，財政收支是無法做到平衡的，更不用說消滅赤字。因為在該階段，通貨膨脹使得許多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產品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為了在保證這些商品正常供給的同時。防止這些商品價格因成本上升而提高，中國政府不得不增加財政補貼，加大了財政赤字。1986年財政赤字為250億以上，1987年為400億以上，1988年為500億以上，1989年為600億以上，而1990年，本應由財政支付的企業虧損和虧損企業發工資這兩筆無法償還的資金，至少占到當年新增貸款的15%，當年實際赤字已超過1000億。加上“帳面調整”掩蓋的收支差額，實際赤字額更大。中國各部門為使向上報告赤字減少，採取了許多類似虛盈實際虧損型企業所搞的“帳面調整”措施：一是公開借債却不列入預算，成為減少帳面赤字的暗債。如1987年的重點建設和地方財政兩筆債券共82億，1988年國家建設和財政兩筆債券96.17億元，1989年的125.67億保值公債等，即是公開借債却未見諸預算的暗債。二是用銀行信用資金填補國家稅收短缺不列債。例如，財政週轉不靈，向銀行借債不列債；國營企業虧損補貼的撥付衝減不足額、不及時，企業虧損掛帳財政不補，企業不銷，長期占用貸款不還等，本應為回債却未列債；對近兩年國營企業大幅度增虧，則乾脆由銀行代財政發放實為企業虧損補貼的“安定團結”貸款。三是當年超支不列支，或甩到下年列支，或以扣減下年指標抵當年超支；最後，國家決算報告的赤字額是中央赤字由地方

結餘抵補後缺的額，而現體制規定，地方結餘留歸己用並不上交，所以，用於彌補當年中央赤字的透支或借債額顯然大於國家預算報告的赤字額。可見，治理整頓要求消滅赤字目標也沒實現。

第四目標是在着力提高經濟效益、經濟素質和科技水平的基礎上，保持適度的增長率，爭取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5—6%。從治理整頓所達到的效果是令人失望的。一是經濟效益不僅沒提高，相反還下降。中國企業在財政緊縮，金融緊縮和市場疲軟三面夾擊下，企業首先面臨的是流動資金十分短缺。新建擴建企業基本建設項目在建設時就沒有準備足夠的鋪底流動資金，新項目建成一般得向銀行貸款。同時，老企業由於擴大再生產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需要占用的資金嚴重不足，企業由於缺乏流動資金而無法啓動。企業其次面臨更新和改造固定資產的資金不足，企業要求增加固定資產貸款也無法保證，所以企業也無法啓動。企業最後面臨產品銷售問題，大量產品積壓，占用很多資金，企業更無法有効運轉。為此中國大部分企業效益下降，虧損嚴重，財政所支出的企業虧損補貼逐年增加。1988年企業虧損補貼為446.46億元，1989年為598.88億，1990年為578950億元。國營獨立核算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實現利稅由1988年的20.2%下降為1990年的12.9%；資金利税率由1988年的20.6%下降為1990年的12.4%；資金利潤率由1988年的10.4%下降為1990年的3.2%；每百元工業產值占用流動資金由1988年的25.8元上升為1990年的31.8元；可比產品成本1989年和1990年分別比率提高22.20%和7%。二是中國經濟不但未能實現穩定增長，相反出現經濟大滑坡。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由1988年的20.79%下降為1989年的8.54%，1990年進一步下降為7.76%。從月份上看，1989年三季度起工業增長回落，9月份增長率為0.9%，10月份更跌為-2.1%，是改革十年中的首次負增長，以後數月則在停滯中徘徊。